

新自由主義是什麼？

三種理論觀點的比較研究

夏傳位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新自由主義引發許多學術爭議的一個主要來源，或許是因為它「千變萬化」：一方面不同立場與傳統的學術論述從各種角度去定義它；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在各個地區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形式，甚至指涉迥異的對象。如果一個詞彙可以無節制地擴散指涉所有事物，那麼這個詞彙被認為用處不大，也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以「多樣性」(variety)作為問題意識，聚焦在三條主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以及晚近受到 Michel Callon 啟發從 STS 進路對市場的見解，既探討各種不同學術論述對新自由主義的不同理解，也探討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表現形式。本文認為一個較周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必須掌握結構、制度、過程及行動四個面向。總體來看，我們或許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為了挽救積累危機而建構的規則體系或技術物，就實質內涵而言，包含了霸權計畫、市場制度、國家形式與市場展演性(performativity)等諸元素。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調節學派、新制度主義、地理尺度、展演性

What is Neoliber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huan-Wei Hsi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One of the main controversies that surrounds academic discussions about neoliberalism may originate from its variegation. On the one hand, many conflic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have been mobilized to analyze it; on the other hand, neoliberalism denotes different things and embodies different forms in different places. So,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any people feel this term carries little analytical weigh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variety” as a problematic, tracing three main traditions: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o-institutionalism, and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approach inspired by Michel Callon. While each tradition may penetrate some important facets of neoliberalization as a process, they fail to capture others. How can the “varieties of neoliberalization” be understoo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t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neoliberalism if we grasp its four facets at the same time: structure, institution, process, and action. In sum, we may regard neoliberalism as an artifact that reacts to the crisis of world capitalism’s accumulation, and its contents include hegemonic projects, market institutions, state forms, and market performativity.

Keywords: neoliberalism, Regulation School, neo-institutionalism, geographic scale, performativity

一、前言

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在近十年來大有蔚為風行之勢，雖然累積了連篇累牘的論文及專書，但關於新自由主義是什麼、其運作機制為何、影響力有多大，甚至基本現象是否確立，都存在高度爭議。爭議的一個主要來源，或許是因為它「千變萬化」：一方面不同立場與傳統的學術論述從各種角度去定義它；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在各個地區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形式，甚至指涉迥異的對象。如果一個詞彙的內涵模糊不清，又無節制向外擴散，那麼許多人認為這個詞彙用處不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以「多樣性」(variety)作為問題意識，既探討各種不同學術論述對新自由主義的不同理解，也探討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表現形式如何理解。在這些紛亂的模式之下，我們是否可以理出一些共同的線索，試著為它畫出恰當的邊界？

我們可以將新自由主義視為一項以「市場至上」原則重新打造世界政治經濟制度的計畫。它有意識形態的一面，強調市場、個人自由、國家退位(Harvey 2005: 2-5)；它的知識來源及正當性基礎是新古典經濟學在全球知識場域的霸權，並且與後者互為支援及共同擴張(Fourcade 2001, 2006, 2011; Callon 1998a)；它涉及國家治理形式的再結構(Brenner, Peck and Theodore 2010a: 183)；也是一股積極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力量，讓資本能無阻礙地在世界各地流動(Guillen 2001)。

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學術反應擺盪在二個極端之間：一個是在鉅觀層次勾勒總體趨勢轉變，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積累危機所爆發出來一股向外擴散的同質化力量，主張此觀點的人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Arrighi 1994; Brenner 1998; Harvey 1989, 2004, 2009, 2010)；另一個則聚焦微觀層次的權力機制，認為新自由主義在不同地方有殊異而混雜的表現形式，彼此之間沒有系統性的根源與連結，如受傅柯影響的人類學屬之(Ong 2006, 2007)。這二股對張的詮釋，徘徊

在一與多、全球同質化與在地多樣化的爭執之中(Brenner et al. 2010a; Springer 2012)。

本文的研究策略是，既然「市場」是新自由主義定義的核心，那麼關於新自由主義相互衝突的評價，事實上跟不同理論傳統如何分析及評價「市場」有密切關聯。本文聚焦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以及受 Michel Callon 啟發的 STS 進路這三條主軸來討論，釐清「市場」的各種不同概念化方式及方法論進路，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歧異的來源，並嘗試相互整合、截長補短的可能性，提出一個理論上較為周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

二、馬克思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

當代馬克思主義傳統討論新自由主義崛起的一個最常見的起點，是從 1970 年代福特主義(Fordism)崩潰開始談起，而這個名詞源自法國「調節學派」(The Regulation School)。此一充滿內部歧異性¹、非常有活力的研究綱領不斷被其他同情、親近其立場的學者挪用、擴大並深化(Jessop 1990, 1997; Jessop and Sum 2006)。²在這一廣袤而複雜的領域中，所有人的共識是：二次戰後盛行於西方世界的福特主義瓦解了，但接續下來的是什麼？答案卻是人言言殊。其中一個極端如調節學派本身，強調在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³的彈性化共同趨勢中，出

1 根據 Jessop (1990)、Jessop 與 Sum (2006)的整理及分類，整個調節學派可以分為七大支，包含了最主要、也最為人知的巴黎學派，以及來自其他法國地區、北歐、西德、阿姆斯特丹、美國等分支。由於調節學派的概念大多透過巴黎學派的著作而為人知，以下本文提及「調節學派」時，專指巴黎學派學者，其重要著作有 Aglietta (1979)、Boyer (1990, 2000)、Boyer 與 Saillard (2002)、Boyer 與 Durand (1997)、Lipietz (1985,1987)等。

2 如從國家理論切入的 Jessop (1990)、經濟地理學的 Harvey(1989)及 Tickell and Peck (1992)、世界體系理論的 Arrighi (1994)、從文化角度談社會運動的 Steinmetz (1994)等等。下文稱「泛調節學派網絡」時，指涉調節學派學者與其他親近學者之間共同組成的論述發展、挪用及對話網絡。

3 我們可以為這個名詞下一個描述性定義：資訊科技的發展、彈性化的勞動過程、去工業化、生產及服務的外包、消費品味的分眾化及強調行銷與設計、後現代認同政治、跨國公司主導的新國際分工以及國家控制弱化、金融全球化等等(Hall 1988: 24)。下文可以看到，泛調節學派網絡的眾多學者對後福特主義的特徵及成因並未達成共識。

現了各種各樣的另類積累體制彼此相互競爭，像福特主義那般橫跨各國、定於一尊的情形已不復出現；另一個極端如 David Harvey (1989, 2005)與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傳統的 SSA 學派，⁴勾勒了全球新自由主義作為接替出現的新階段。⁵ 這些歧異的看法反映了本文的謎題：在 1970 年代世界性資本主義危機之後，有沒有共同的趨勢？如果此一趨勢可以稱作新自由主義，那麼它又是如何與各地殊異的制度安排接軌？以下我分別簡介法國調節學派、Harvey 及美國 SSA 學派的答案，並檢討其優、缺點。

調節學派從對新古典經濟學和結構馬克思主義的雙重批判中誕生 (Boyer 2002a: 13-4)。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用抽象、一般模型來理解經濟行為及其規律，調節學派跟博蘭尼(Karl Polanyi)一樣將經濟行為放置於實質的社會關係及制度中來理解；相對於結構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透過政治、法律和教育等上層建築進行的自我再生產(reproduction)是自動且確保的，調節學派認為資本積累過程永遠存在失敗的可能，因此需要一套相互配合、嵌樸的社會關係——稱作「調節模式」——來暫時穩定它，藉此資本主義經歷了擴張上升；但外在環境變遷終歸讓這組社會關係失效，不僅不能穩定，反成積累阻礙，此時資本主義便收縮下降。於是，調節學派凸顯了資本主義經歷收縮與擴張以及階段性危機的動態過程。

調節學派並非僅僅基於歷史興趣而探究福特主義，其目的是了解危機的性質，以及尋找後續的積累體制及調節模式(Jessop and Sum 2006: 251)。福特主義的最大特徵在於勞資之間存在著制度性協商管道以分配生產力增加的果實，讓大量生產配合大量消費，同時政治凌駕經濟，國家作為協調金融與貨幣、經濟生產及消費活動的基本政治空

4 SSA 是「積累的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的簡稱，SSA 學派是美國獨立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傳統，跟法國調節學派在概念及研究綱領上都非常接近，SSA 約略等同於「調節模式」。

5 但他們也都強調新自由主義不穩定、危機四伏及自我摧毀的特徵，因此是否符合「調節模式」(mode of regulation)的定義——化解生產關係中的內部矛盾，成為資本積累穩定而長期的社會安排——是大有疑問的。於是，當他們將新自由主義指稱為一個新的資本主義階段時，其實已經放寬了原先的定義。

間扮演著重要角色(Boyer 2002b: 232)。福特主義的衰微有四項原因：(1)福特主義所帶動的生產力革命逐漸消失；(2)但是社會支出卻未減少；(3)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造成國家總體經濟管理的難度增高；(4)大量消費的生活方式也逐漸轉變為多樣化及分眾化(Nielsen 1991: 24)。

在福特主義之後，調節學派區辨了非常多樣的成長體制(growth regimes)，譬如代表結合大量生產及產品多樣化的豐田主義(Toyotism)、以資訊科技革命為導向的新熊彼得主義(neo-Schumpeterian)政策典範、以第三義大利工匠業為模型的彈性專業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模式、全球垂直分工(vertical disintegration)所帶來的產業聚落化(agglomeration)發展、東亞外銷導向經濟、知識經濟、服務導向經濟、金融導向經濟等等(Amin 1994; Boyer 2000; Freeman and Perez 1988; Piore and Sabel 1984; Storper and Scott 1989)。

在這些分析背後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他們的焦點一直聚集在中間層次(meso-economic analysis)，這反映方法論上強調研究對象必須由制度及歷史所建構(Saillard 2002: 184)，在福特主義之下，這個層次一直是國家；其二是區域(district)及國際(international)這兩個地理尺度(geographic scale)的重要性開始浮現，並開始分析三個地理尺度之間的互動及其統理(governance) (Benko and Lipietz 2002: 191; Jessop and Sum 2006: 247-51)；但是作為調節的空間(the space of regulation)，重要性卻非常不同：區域的重要性在世界經濟不均衡發展中被凸顯（如科技城、工業園區、創新區域、產業聚落等），但「國際」仍不被認為是一個有效、具正當性與持續性的調節空間，各國發展軌跡在此碰撞與競逐，卻沒有形成明確的結構，不是因果力量的場域，跨國公司也不是新國際分工的發動者(Benko and Lipietz 2002: 195)。

其結果是大幅低估了「全球」(global)層次結構力量的強制性，以及在變遷環境下，全球結構力量主動選擇、創造出地方或區域「調節空間」的能力。譬如，電子產業的跨國資本利用 1994 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簽訂，快速形成了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區域生產分工及整合，但是由於運輸成本降低、生產技術進一步模組化等因

素，在 2000 年左右被美、中、台的全球垂直分工體系所取代 (Ancelovici and McCaffrey 2005)。這顯示地理尺度本身也被捲入全球資本流動的過程中被生產及再生產。

Harvey 的作品(1989)在這個脈絡中，可被視為從中間(meso)分析層次重新回到鉅觀(macro)層次試圖解明福特主義發生危機及其轉變的邏輯或機制。他回到《資本論》關於資本積累內在衝突的基本觀點：資本要能擴大發展，必須萃取相對剩餘價值，但這同時也壓低了勞工的購買力，週期性地產生「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的結果，於是就有各種形式的「時空替置」(temporal and spatial displacement)策略產生。

「時間替置」意謂著將當前閒置的資源轉移到未來的收益，譬如以金融手段創造出各種「虛擬資本」(fictitious capital)、土地和房產投機炒作等等。但是，被替置的剩餘資產是否在未來能以更高的報酬率實現，存在著風險和不確定，只是將問題拖延到未來而已。「空間替置」意謂著以地理擴張的方式，將閒置的資源投射到世界其他區域進行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及積累。這同樣只是暫時有效，長期而言，當新世界的資本主義也出現過度積累時，將回過頭來與舊世界進行激烈的競爭，惡化過度積累之危機。

後福特主義（或新自由主義）並不脫上述馬克思勾勒的資本深層運作邏輯（即萃取剩餘價值及過度積累），只是發展出新的時空替置策略，Harvey 稱之為「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加快決策速度、加快生產流程、縮短產品生命週期、加快時尚與消費慾望的變化（即時間壓縮）；打破地理疆界，利用群聚經濟將生產要素做最佳配置（空間壓縮）。如此呈現的「彈性積累體制」(flexible accumulation)，其真正有意義的改變在於金融市場的異常活躍以及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因為彈性積累乃是以金融體系作為全球協調各種時間、空間彈性化措施的控制中樞；換句話說，運作原則和機制是舊的，但手段是新的(Harvey 1989: 186)。

於是，Harvey 非常精采地從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角度，

說明了福特主義的崩潰與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將調節學派指認的各種發展體制都置於同一個運作邏輯之下，既有深層的一致性，又有表現形式上的創新。

近來，SSA 學派進一步勾勒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性基礎，其跨越國家界線、以全球為範圍而建構的社會結構正是其定義性特徵，包括了：(1)全球經濟高度整合，貨品、服務及資本在全球無阻礙的流通；(2)生產分散化在全球各區域，然後透過貿易及跨國公司的供應鏈管理重新組合起來；(3)隨著全球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勞工階級也逐漸國際化，勞資關係的權力天秤大幅倒向資方；(4)利用「空間化」(spatialization)策略作為勞工控制的手段；(5)金融化，表現在金融部門占整體經濟產出的比例愈來愈高，而且在更深層的意義上，金融手段改變了實體經濟的運作方式；(6)國家權力的空洞化；(7)生產過程的彈性專業化。(Kotz and McDonough 2010: 98-108；同時亦參見 O'Hara 2005; Went 2002)

雖然 SSA 學派認為，全球積累社會結構之誕生，不意謂著各國資本主義制度趨向同質化；相反地，資本主義制度在國家與地方層次的歧異性，正好是資本在全球層次進行積累及自我複製的先決條件 (McDonough 2010: 36)。但是，如同上文所述，整個泛調節學派網絡對於福特主義瓦解之後的歷史發展有很大的分歧，一方強調全球結構的系統性和強制性，另一方強調地方不可化約的制度多樣性；對於新自由主義如何銜接全球與地方，在不同地理尺度之間的辯證動態發展過程也不清楚。換言之，對於一個較周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來說，馬克思主義擅長掌握結構及制度的面向，對於過程及行動的面向則不清楚。

儘管有上述的分歧，但馬克思主義傳統對於後福特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所釋放的市場力量之態度和評價卻是一致的，亦即對於市場的摧毀力量提出道德警告(Fourcade and Healy 2007)。馬克思主義傳統上將市場視為掩蓋剩餘價值萃取的機制，在對等交換的表象下掩蓋了剝削，但福特主義透過勞資協商、福利制度、國家對貨幣與財政的管理

等等，限制了市場，也為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長期而穩定的基礎。福特主義危機則釋放了市場的力量，藉著吞噬所有社會領域而滋養，但同時也破壞了自身所依賴的社會基礎。於是，Wolfgang Streeck (2011: 25)不無諷刺地稱新自由主義為一個自我摧毀的社會形構，它需要博蘭尼所謂「社會自我保護」的反向限制力量，來「保護」此一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免於自我摧毀。所有人對於無節制市場的自我摧毀傾向都沒有疑問，但調節學派由此推論一個足以替代福特主義的跨國穩定調節模式尚未出現，並保持未來政治與行動的開放性；Harvey 及 SSA學派則警告一個新而危機四伏的資本主義模式已然出現，有可能拖著整個社會領域一起陪葬。

不過，市場擴張及限制、去鑲嵌與再鑲嵌的過程需要進一步深究，以免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被簡化為一個「由上而下強加、由中心向外擴張」的想像模型。於此，新制度主義從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的角度對於「制度」提出了更具文化、歷史及政治意涵的理解，解釋了制度在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中形成與擴散的機制，並對制度與能動性(agency)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微觀基礎(Jepperson 2002)，補足了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在過程及行動的面向上的不足。

三、新制度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

（一）新制度主義的推進

此項由 1970 年代晚期興起的運動，認為現代組織所體現的制度形式及程序，是西方社會特殊歷史、文化的產物，之所以被採納而延續下來，並非因為最具效率或體現了超越理性，而是因為人們相信具有較高的正當性，其本質與原始社會的儀式(ceremonies)或神話(myths)無異。制度提供了認知範疇、劇本或模式讓人們據以詮釋世界並採取行動(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此一學派從文化權威取得的角度來看制度如何興起與散布。其中 John Meyer 關於世界社會的先驅研究，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流傳特別

有啟發性(Meyer et al. 1997)。世界社會的「無國家」(stateless)性質並未讓其淪落為無秩序及無規則的狀態（如成為個別國家的實力競技場），反而是西方現代性規則與文化形式的豐富儲藏地，現代民族國家就是最典型的產物——它們都具有類似的憲政機關、人權概念、GDP統計格式、國民教育、發展政策、疾病與公衛定義等等。這些文化儲藏又因為世界社會中的眾多行動者，如國際組織、科學社群、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團體等，在不同地理尺度之間的複雜互動而有著非常動態的發展。制度傳播與取得普遍性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的因果解釋力之過程，不能直接化約為國際政治經濟結構（如世界體系）。

此一觀點讓我們跳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積累結構的單一角度來解釋新自由主義，並注意到新自由主義也提倡一套特定的制度安排、主體觀、秩序觀、效率觀及因果推論方式。新制度主義引導我們追問：這些特定制度形式的文化權威由誰賦予？被誰散布？如何散布？這讓我們開始得以將新自由主義的「不均衡地理發展」當作一個過程來研究。

Beth A. Simmons 等人(2008)編著的選集即是在此一精神下的集體成果。這本書探究的是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全球擴散，作者群認為政治與經濟自由主義——以民主化、跨國資本移動、減稅、國營事業私有化四項指標為代表——已經充分國際化，構成一股任何國家都無法迴避的壓力、限制或機會(ibid: 9)。但是，作者群強調自由化趨勢的「不均衡地理發展」，並且認為差異既有來自各國國內的因素，也有來自系統互動的因素：亦即任何國家採取新政策往往不是獨立決策的結果，而是對國際組織、跨國大企業或其他國家政策作為的一種因應；後者正是本書的焦點。

Simmons 等人提出四種自由化政策的散布機制：強制(coercion)、競爭(competition)、學習(learning)及仿效(emulation)。民主化大多透過「強制」機制散布；跨國資本移動大多透過「競爭」機制；減稅部分透過「競爭」機制（如美國）、部分透過「強制」機制（如歐盟）；國營事業私有化則是「學習」與「仿效」機制的混合。

此一研究的貢獻在於在系統互動的層次上，推進了人們對於新自由主義散布路徑的理解；但這份研究仍無力矯正、乃至複製了新制度主義在概念化制度散布機制時的兩項固有缺陷：其一，如同 Peter Hall 與 Rosemary Taylor (1996: 954) 的批評，這種勾繪制度同構過程的方式非常「無血肉」(bloodless)，遺忘了現實中制度的創新與改革經常牽涉了不同利益行動者之間的權力衝突；⁶ 其二，新制度主義的學者們仍然以民族國家作為制度叢結的自然載體，並以此來理解新自由主義化的各種變異；如此，對於民族國家層次以下的各種新自由主義化動態發展也就難以給予充分正視。如此一來，仍舊陷入了一與多、全球普遍性與在地多樣性的對張陷阱。

因此，一個對於新自由主義散布機制的完整勾勒必須清楚區分各個不同層次的地理尺度，說明每一個層次的權力空間如何構成，涉及哪些行動者組合，以及這些行動者又如何穿梭在不同層次之間產生複雜互動。

(二) 各層次地理尺度的構成

1. 二層地理尺度

第一種作法是區分為二層地理尺度：全球與地方，或外在普遍化的新自由主義挑戰與內在反映特殊歷史脈絡的政治過程。所謂「全球」指的是「結構」及「論述」，透過全球機構展現了將其意志和目標擴展到全球範圍的結構力量；同時全球行動者也發展出一套普遍聲稱的論述來正當化並維繫其全球擴展的意圖。

所謂「地方」不應該等同於世界體系中的邊陲國家。較好的用法是指涉所有國家層級或次於國家層級的單位或社會制度，不管是核心

6 本文討論的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相當於 Hall 與 Taylor (1996) 所說的「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Hall 與 Taylor 強調制度的起源、維持與變遷有多重來源：來自先前歷史遺產或結構環境所限定的路徑(path dependence)、理性策略互動的結果、對社會情境的詮釋，以及不同團體之間的權力爭奪。這是綜合了三種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及社會學制度主義—各自的理論長處而達成的結論。本節以下的文獻回顧大致上與此觀點相符。

國家或邊陲國家也都是「地方」。所不同者，在於核心國家的人、組織或社會制度有能力「穿透國家邊界，擴展其勢力至全球，並且將其他敵對的社會制度或團體指稱為地方」(Jenson and Santos 2000: 11; Carruthers and Halliday 2006: 534)。

在全球／地方之間，又可區分兩種過程：其一是「地方全球化」(globalized localism)，亦即從地方擴展至全球、從特殊化為普遍的過程；其二是「全球地方化」(localized globalism)，亦即一個全球規範文本如何被落實到地方的特殊生態。

就「地方全球化」而言，Neil Fligstein (2001)提供了早期的貢獻，他的市場理論之特色在於從權力宰制和文化理解的觀點來勾勒市場興衰的動態變化。Fligstein 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內涵是興起於美國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強調「股東價值」的控制概念(the shareholder value conception of control)，強調以股東獲利為評價公司表現的唯一標準。作為一個文化——政治概念，它正當化了外部投資人的利益及權力以凌駕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之市場安排。

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過程就像一場社會運動。「股東價值」控制概念的倡導者來自外部的投資銀行、共同基金等法人投資者，他們援引了金融經濟學(financial economics)、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等新古典經濟學的最新發展，席捲大部份業界，隨即引發了眾多公司內部的權力鬥爭，不捍衛股價的公司等著被併購、經理人被撤換。於是，愈來愈多經理人主動或被迫擁抱股東價值。雷根政府減稅、鼓勵併購、打壓工會的政策，也扮演了推波助瀾之力。

到了九〇年代，此一控制概念與全球化論述合流之後正式坐大，將誕生於美國國內（也就是特定市場、地方性）的控制概念包裝成一股橫掃全球的、均一化的必然趨勢，為新自由主義向外擴張提供了正當性(Fligstein 2001: 155)。

其次，就「全球地方化」而言，Marion Fourcade 與 Sarah Babb (2002)從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權力位置、內部階級勢力消長，以及政策傳統和制度安排等，說明了為何相同的全球化壓力，卻在智利與英

國、法國及墨西哥四個國家造成不同的結果。她們區分了「新自由主義化」的兩種模式：一種是高度意識形態化、政治化與教條化，後來碰到困境才改採務實漸進之路（如英國與智利）；另一種是小心務實，僅片面實施其中一部份政策（如墨西哥與法國）。

智利與墨西哥身為開發中國家，感受國際金融的強制壓力遠大過英國與法國，這導致具有外在正當性權威（譬如畢業自美國名門大學）或與國際金融機構有密切關係的高階技術官僚掌握經濟決策權，主導了新自由主義化的節奏；但在英國與法國則未出現此種情況。另一方面，「內在政治過程」也有獨立的因果效力，英國與智利雖然分屬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陣營，但兩國在新自由主義化之前的國內政治都非常失敗，低經濟成長無法平息國內階級的衝突，嚴重通貨膨脹又進一步刺激階級對立，引發治理危機。在這種情況下，邊緣學說與團體以高度意識形態的姿態，或透過政變或透過和平選舉，奪取國家機器，以政治手段進行激進改革，弭平社會紛爭。

但法國與墨西哥的共同特徵是較強的國家機器、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以及國內階級相對和平（部分出自工人運動的弱勢與分化），經濟決策官僚的威信並未被削弱，結果是「新自由主義化」過程由國家技術官僚本身所發動，其方式較緩和與務實，與過去的政策體制沒有出現太大的斷裂；其目標在於進一步國際整合的利益（墨西哥是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法國是加入歐盟）。

另外一些理論家及經驗研究運用了更複雜的分析架構，進一步將「民族國家」與真正的「地方」區分開來，從而更細緻化了對於新自由主義散布路徑的理解。

2. 三層地理尺度

Neil Brenner 等人(2010b: 336-339)從治理重構(regulatory restructuring)的角度，跟Fligstein一樣，企圖勾勒新自由主義從在地實驗逐漸普遍化的過程。他們區分了三個階段：「地方層級的管制架構實驗」、「跨國政策模仿及散布網絡」以及「超國家層級的規則體系」。

從歷史的角度看，1970年代在某些地方層級（如英國及智利保守政黨）出現了零星而分散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傳播管道侷限於點對點（如芝加哥大學到智利首都），且被全球層級的凱因斯主義規則體系之「敵意」環境所包圍。後者在嚴重的資本主義積累危機之下，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攻擊；然而，危機的定義及解決方案仍舊使用凱因斯主義式的詞彙，而跨國政策模仿及散布網絡流傳著各式各樣的凱因斯主義危機管理方案。

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實驗不再侷限於地方層級或點對點，而是持續在跨國政策模仿及散布網絡中循環流通，某些政策組合已經在各個地理尺度及重要區域上演，並相互整合與共同演化；此時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作為「超國家層級規則體系」的地位瓦解，被無秩序、極度競爭的叢林法則所取代(Peck and Tickell 2002: 385)。這種情況特別有利於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其道理就像「一國社會主義」在競爭的資本主義環境下難以生存一樣，在資本自由移動的環境下，各國都感受到削減福利支出，創造「友善投資環境」的壓力。

1990年代以後的特徵是，新自由主義已經上升至超國家層級的規則體系，不論是市場至上或限制市場的制度改革或治理實驗，都發生在一個已然新自由主義化的全球架構之下。這個階段不再要求「國家退位」，反而是要建設、鞏固一個常規化的新自由主義國家形式，將逐步摸索、實驗出來的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規則、模式和實踐予以制度化。跨國政策模仿及散布網絡被動員來處理前一回合新自由主義化所遺留的矛盾及危機；為了因應這些危機，出現一系列市場手段之外的治理與管制措施，包括各種市民社會論述、社會資本的概念和技術、地方自治、公私合作、朝威權主義結合，或凱因斯主義的部分復甦等等。

而全球層級的新自由主義文本又持續向地方層級（國家與國家以下單位）擴張與施壓，全球與地方持續互動及磋商，一方面形塑地方的新自由主義多樣性，另一方面也回饋與強化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同質性。

Brenner 等人的討論維持在相當抽象的理論描述層次。對此，Bruce Carruthers 與 Terence Halliday (2006)的研究恰好用一個跨國比較的經驗研究實際展示了這樣一個跨越多層次的研究如何可能。他們關心的是 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後，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以下簡稱 IMF】、世界銀行、聯合國、亞洲發展銀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等）感到有必要在東亞地區推行一套完整的、符合國際體例的企業破產法體制，以有效因應及預防未來發生類似的金融危機。這是一個典型的全球化過程，以核心國家爲主的國際機構將價值和制度推銷到全世界各地。Carruthers 與 Halliday 比較南韓、中國及印尼三個個案，探討「地方」、「民族國家」與「全球」三層之間各種錯綜複雜的交織及互動。

Carruthers 與 Halliday 呈現的是一幅色彩斑斕、如萬花筒般的拼貼圖案。作者們從兩個座標來測量全球／地方的關係：一是個別國家（地方）在全球「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場域中的結構位置；二是個別國家在社會及文化上跟「全球」之間的相似程度或「距離」(“distance”)。

全球／地方的「權力平衡」從來不是固定的，隨時間、議題和國家而有不同。譬如當南韓陷入金融危機時，面對全球機構的壓力就比平時更脆弱；另外，相對於經貿議題，任何國家在國家安全議題上也更不容易妥協。「社會文化距離」是另一個影響全球／地方關係的變項，和「權力平衡」又往往不同調。譬如印尼在權力平衡上的自主性遠小於南韓，難以拒絕全球機構的任何要求，但社會文化距離卻構成直接適用全球文本的障礙；相對而言，南韓的自主性高，然而經濟決策官員大量出身自美國名校，在與全球機構協商時，大大有利於全球文本的穿透。中國的自主性高、社會文化距離也大，是全球文本最難穿透的國家。

其次，Carruthers 與 Halliday 凸顯了中介者／轉譯者在不同層次之間錯綜複雜的磋商及互動時扮演的關鍵角色。不同層次的地理尺度各有不同的關鍵中介者與行動者，譬如在國際機構與東亞三國磋商破產

法制的立法過程中，具有關鍵影響力的是有國際背景的學者、政府官員和律師；但在執行過程中，變成一般民眾、工會、地方企業及政治人物取得主導地位。這兩個過程可能有非常大的差異，執行過程可能讓全球規範文本只是形式上被採納，實質內容卻完全扭曲，以符合地方的理解、利益和生態。

在每一個層次內部也存在著分裂的不同勢力。在全球層次，不同的核心國家爭奪制定全球規範文本的權力；在民族國家層次，不同政府部門有著不同的利益及國際化程度（如金融部門與法務部門的國際化程度不一樣，跟全球機構的連繫及信任都不同）；在地方，不同的行動者也彼此相爭。即使在同一個民族國家內部，政府官員、企業及勞工之間也存在衝突的利益，因此在不同層次之間的行動者也有非常複雜的合縱連橫。譬如南韓不僅接受IMF 紓困貸款所附帶的「結構調整方案」，還自行推出更徹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IMF 成了南韓官員的政治籌碼，用來瓦解國內的反對聲浪；IMF 事實上是「強迫」南韓做了它本來就想做、但沒辦法做的事。話雖如此，南韓仍在企業重組的關鍵程序上拒絕接受國際機構推銷的方案(Carruthers and Halliday 2006: 560)。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印尼。雖然印尼接受破產法制的過程非常接近新制度主義者所說的「強制同構」，但 Carruthers 與 Halliday 細緻的民族誌仍然發現印尼的非政府組織及政府內部改革派具有某種程度的能動性(agency)，它們藉著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來對付政府官員，推行本土改革。於是，全球／地方互動、協商的结果從全盤接受到全盤拒絕之間，有許許多多種可能(Carruthers and Halliday 2006: 532)。

總結而言，上述幾個研究成果共同將市場視為一個獨特歷史與社會建構的制度，並且可以當做一個向外散播的社會過程來研究；因此他們能夠將新自由主義當作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事物，並試圖打開新自由主義散布的黑箱子，也凸顯了其中使用新古典經濟學概念、模型、指標、數據，來分析、診斷現實經濟或提出改革建言的中介者／轉譯者／行動者的重要性。換言之，對於一個較周全的新自由

主義研究綱領來說，新制度主義凸顯的是對制度及過程的掌握。

但我們該如何看待經濟學家與市場的關係呢？新制度主義會說，這些人透過其專業權威成為制度同構的傳播者；但這樣的說法還不夠聚焦在新古典經濟學與市場的特殊關係之上，同時也涉及新古典經濟學的全球學術霸權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共構與相互支援。正是在這些問題上，Michel Callon 從 STS 傳統對經濟社會學鑲嵌概念的介入，顯得十分重要。

四、STS 進路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

Callon 的核心問題是：市場中行動者「理性計算」的能力 (calculative agency) 從何而來？他從物與物的關係、科技、程序、方法及各種機制來考察市場主體及其行動之構成。他最大的貢獻在於，認真對待新古典經濟學及其物化邏輯，並為其事實上的效力（而非真理聲稱）尋找一個堅實的基礎，用他的話來說，是市場是鑲嵌在經濟學理論之上(Callon 1998a: 1-52)。

「構框」(framing) 是市場中進行理性計算的前提。交易需要一個架構，將某些人或人的部分面向、關係以及物品納入計算範圍之內，將另一些人、物與關係切斷(disentanglement)；它需要交易範圍內的人、物及關係都有清楚可界定的特質，能與其他人、物及關係分開(Callon 1998a: 16-18)。市場交易也就像 Erving Goffman 的劇場一樣，要有清楚的規則及角色，觀眾與演員有共同的認知及默契，演出要有清楚的界線、占據明確的空間以及各種道具和物質結構的支撐(Callon 1998b: 249)。但從另一面看，有「構框」就有「溢出」(overflowing)，有「切斷」就有「藕連」(entanglement)；於是「構框」是從無所不在、無所不連結的「溢出」中使用暴力硬生生切出一塊清楚界定好的舞台，讓行動者於其上扮演清楚界定好的角色。

Donald MacKenzie (2008) 將 Callon 的模型運用在美國期貨暨選擇權市場的建立與發展之上，用一個個案研究展示了 Callon 模型的可操

作性。他說明金融經濟學(financial economics)模型包含了許多明顯錯誤的前提，但最後卻能「準確預測」，真正的原因在於它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人們在金融市場中使用模型，結果使得市場行為看來更符合理論預測。換言之，金融經濟學的威力來自於積極塑造現實的力量，MacKenzie 稱之為知識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⁷

Callon 及 MacKenzie 運用了一種特殊的鑲嵌概念，其中法則性、命題性的科學陳述本身就是一種被掩蓋、被誤認的規範性語言，因此原先被認定為「去鑲嵌」的市場規律其實是自我鑲嵌。是故所有經濟論述同時都是對於經濟效果作出道德評量的論述；在這個意義下，經濟學宣稱的法則，應該從正當化聲稱的角度視之為道德性、政治性的行動（它也很可能以科學及真理之名排斥基於其他道德概念的市場安排），並受到民主政治的檢視及制約，它也指出了新自由主義的擴散機制之一，正是透過經濟的「治理化」(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另一方面，Fourcade (2006, 2011)處理了一個新自由主義研究中長期被低度關注的課題：新古典經濟學如何建構並維繫全球學術霸權？此一過程又跟新自由主義的崛起與壯大有何關係？她指出，經濟學的國際化發生在一個權力高度不均等的全球場域，美國（其次是歐洲）的文憑對其專業領域的權威宣稱是全球有效的；邊陲國家經濟學門必須藉著吸納、引入擁有核心國家文憑的歸國學人，彌補權威之不足。這就好像美國經濟學門在制度上擁有認證並核發全世界經濟學家的專業資格一般(Fourcade 2006: 152)，其結果是讓核心國家及邊陲國家在

7 「展演性」一詞借用自語言哲學家 J. L. Austin 區別「敘境話語」(constative utterances)與「做行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s)之不同。在後者，「說」與「做」是不分的；「說」即是「做」。但 MacKenzie 表明他沒有使用「自我實現的預言」這個一般人更熟悉的社會學語彙，是因為「預言」一詞讓人聯想到人們腦袋裡想的信仰或世界觀等主觀事物。MacKenzie 完全不否認文化對市場建構的重要性，但他更想強調的是另一種更深層的建構：公式演算、程序、常規與機制，也就是金融市場的「技術性」(technicality) (MacKenzie 2008: 25)。一旦經濟學模型成為市場的一部份，人們不須相信、甚至察覺模型的存在，後者不知不覺影響人們的行為(MacKenzie 2008: 19)。這裡凸顯了 Callon 的 STS 思路。

經濟學的制度及知識內容與風格上皆愈來愈同質化。

新古典經濟學之崛起，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跟民族國家的打造計畫有關。隨著經濟學成為國家統治的工具，國家機器本身也開始經濟化。國家在追求有效統治的過程中，發現經濟發展是可以被刻意培養及創造的；逐漸地，「經濟」被想像為具有獨立自足規律的整體(Mitchell 1998: 84)，而此一想像的前提是國家利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去測量、再現、計算、干預及管理「經濟」。於是，經濟學家的學術權威愈來愈具有公共性及政治重要性，經濟學家也愈來愈躋身政治決策的核心，因為治理技術愈來愈必須透過經濟學來設計並執行。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學科本身的國際化聯結扮演了重要角色。

經濟學國際化除了考量學術網絡（經濟學作為一個權力不均等的跨國場域）之外，也有政策網絡的面向。隨著經濟全球化，政策行動者必須考慮的聽眾及牽涉的對象也有愈來愈多是在國境之外，包括了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市場及各個層次的國際組織。這些組織也是散布某種知識、規則、政策及真理的「認識社群」。藉由這樣的研究，Fourcade 呈現了經濟學術網絡與權力決策網絡的交互滲透，以及新古典經濟學全球霸權與新自由主義擴張的平行發展，跟上述 Carruthers 與 Halliday (2006)的微觀田野調查有著非常好的配合，共同解開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擴張之謎。

總結而言，STS 進路將市場機制、常規及計算公式本身視為一種主動塑造社會的能動性(agency)，而經濟學則扮演正當化打造工程的角色。由此，他們也翻新了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

五、結論

透過以上回顧，本文認為一個較周全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綱領必須掌握結構、制度、過程及行動四個面向。另外，三個理論傳統也從各

自對市場的分析出發，對新自由主義頑強的生命力，⁸ 提出了不同解釋。

馬克思主義傳統主要掌握了結構與制度。資本積累的結構因為內含了階級剝削的本質，其再生產隨時都有失敗的可能，需要制度的調節以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體制。調節學派以此解釋福特主義的興起與衰頹，而新自由主義一方面透過釋放市場力量來修補前一階段的積累危機，本身卻製造更多危機。⁹ 既然純粹市場是摧毀一切的力量（包括其自身的社會基礎），那麼新自由主義依然能夠維持頑強生命力，必然來自一套關於自由、市場、競爭及效率的霸權計畫(hegemonic project)，爭取人民有意或無意的「同意」(consent)，從而確保政治經濟秩序及背後的既得利益能夠持續複製下去。

新制度主義掌握了制度及過程，新自由主義是一套擁有正當性聲稱、可以向外輸出的市場制度，如控制市場的文化概念、國家治理市場的模式等等。各種治理模式之間在促進發展的長期效益上差異不大（如歐洲的「萊茵河資本主義」(Rhine Capitalism)相對於英、美的新自由主義）；新制度主義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頑強生命力來自於外在環境，亦即由世界社會所廣泛散布的「神話」。這同時是動態建構及脫勾(decoupling)的過程，牽涉了「地方全球化」及「全球地方化」。從此一角度看，新自由主義國家(neoliberal state)的職能不僅沒有退位，實際上反而是強化了，透過將權力、責任及風險下放到地方，或

8 譬如 Centeno 與 Cohen (2012: 331) 觀察，在 2008 年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大海嘯之後，美國人民普遍出現了某種文化轉向：對華爾街銀行家及企業執行長的厭惡，對財富不平等的普遍覺察。但是，公眾對於市場的懷疑只是轉化為一股分裂、模糊的民粹主義憤怒，卻不足以質疑、動搖體系的規則。

9 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致認為，新自由主義無助於長期資本積累，甚至危害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穩定（如金融大海嘯），但它短期內能讓部分資本家快速獲利。譬如 Harvey 引述國際勞工組織的資料指出，全球總合經濟成長率在 1960 年代是 3.5%，即使到 1970 年代也有 2.4%，但新自由主義崛起與稱霸的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則各只有 1.4% 與 1.1%；2000 年以後只剩不到 1% (Harvey 2005: 154)。Kotz 與 McDonough (2010: 110) 則指出新自由主義讓資本家短期獲利的五種方式：(1) 增強資本家剝削勞工的力量；(2) 「去管制化」為資本逐利提供了更大的自由；(3) 透過減稅；(4) 透過私有化、去管制化及國家職能外包，資本家可以從掠奪國家資產中致富；(5) 藉著將全球更多空間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

是將國家治理經濟的任務上升到國際組織的方式來完成(Jessop 1999; Peck and Tickell 2002)；於是，新自由主義也指涉了某種特殊的國家形式(state form)。

隨著對於過程的探討，也凸顯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有賴於行動者在各地理尺度穿梭，從事中介與協商新自由主義理念。行動者的理性計算能力從何而來？市場在此被視為是一種更物質性、更深層的建構，是物與物的關係、科技、程序、方法、公式演算、常規與機制。於是，新自由主義的頑強生命力來自於看似中立、不易覺察的市場展演性；即便市場的意識形態破產，我們還是無法輕易拋去運作市場所需的那些技術物及規則。

總體來看，我們或許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為了挽救積累危機而建構的規則體系或技術物，其內涵包含了霸權計畫、市場制度、國家形式與市場展演性等諸面向。它為何如此具有威力？Pierre Bourdieu (1998: 95)提出了發人深省的解答：它是一個「強論述」(strong discourse)，其特點就像精神病院內的心理治療論述一樣，即便錯誤描述這個世界，卻是「自我實現」的：一方面，看來客觀、中立的科學敘述，其實是規範性的「按照自己的形象打造現實」——它告訴讀者該怎麼做才最有效率；另一方面，在它背後有強大的政治經濟權力之「現實」在支撐著，使得它占有真理的位置。

誌謝：本文脫胎自作者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原本文章的架構過大，也有一些經不起仔細論證的宣稱，感謝前、後期主編傅仰止、蘇國賢先生以及編委會對於修正文章架構與方向的建議，也感謝三位匿名評審銳利的詰問與批評，迫使作者檢視自身的盲點，作者在這些批評中學到甚多。另外，文章修改過程中相當程度得益於指導老師謝國雄先生的指點與討論，以及評審們提出的實質建議，一併誌謝。感謝吳介民老師最初鼓勵文章投稿，以及編輯麗玲與圯洋對稿件專業的潤飾與校正，文章的疏漏與文責概由作者負責。

參考文獻

- Aglietta, Michel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min, Ash, ed. (1994) *Post-Fordism: A Reader*. Oxford, UK: Blackwell.
- Ancelovici, Marcos, and Sara J. McCaffrey (2005) From NAFTA to China? Production Shifts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Taiwanese Firms. Pp. 166-193 in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edited by Suzanne Berger, and Richard K. Lester. Armonk, NY: M. E. Sharpe.
- Arrighi, Giovanni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 Benko, Georges, and Alain Lipietz (2002) From the Regulation of Space to the Space of Regulation. Pp. 190-196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ited by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Boyer, Robert (1990)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00) Is a Finance-led Growth Regime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Fordis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Economy and Society* 29(1): 111-145.
- (2002a) The Origins of Regulation Theory. Pp. 13-20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ited by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2002b) From Canonical Fordism to Different Modes of Development. Pp. 231-237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ited by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Boyer, Robert, and Jean-Pierre Durand (1997) *After Ford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 Boyer, Robert, and Yves Saillard, eds. (2002)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ierre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renner, Robert (1998)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1950-98*. New Left Review 229 (May-June).
- Brenner, Neil, Jamie Peck, and Nik Theodore (2010a) Variegated Neoliberalization: Geographies, Modalities, Pathways. *Global Networks* 10(2): 182-222.
- (2010b) After Neoliber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7(3): 327-345.
- Callon, Michel (1998a)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 Economics. Pp. 1-57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edited by Michel Callon, Oxford: Blackwell.
- (1998b) An Essay on Framing and Overflowing: Economic Externalities Revisited by Sociology. Pp.244-269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edited by Michel Callon. Oxford: Blackwell.
- Carruthers, Bruce G., and Terence C. Halliday (2006) Negotiating Globalization: Global Scripts and Intermedi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n Insolvency Regimes. *Law & Social Inquiry* 31(3): 521-584.
- Centeno, Miguel A., and Joseph N. Cohen (2012) The Arch of Neoliber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317-340.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Pp. 1-40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ligstein, Neil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urcade-Gourinchas, Marion (2001) Politic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ory and Society* 30: 397-447.
-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Profes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1): 145-194.
- (2011) *Economists and Societies: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1890s to 1990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ourcade-Gourinchas, Marion, and Sarah L. Babb (2002) The Rebirth of the Liberal Creed: Paths to Neoliberalism in Four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 (3): 533-579.
- Fourcade, Marion, and Kieran Healy (2007) Mor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 285-311.
- Freeman, Christopher, and Carlota Perez (1988) Structural crisis of adjustment, business cycles and investment behaviour. Pp. 38-66 in *Techn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Theory*, edited by G. Dosi, C. Freeman, R. Nelson, G. Silverberg, and L. Soete. London: Pinter.
- Guillen, Mauro F. (2001)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235-260.
-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1996)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XLIV: 936-957.
- Hall, Stuart (1988) Brave New World. *Marxism Today*. October. Pp. 24-29.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2004)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enson, Jane, and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2000) Introduction: Cases Studies and Common Trends in Globalizations. Pp. 9-26 in *Globalizing Institutions: Case Studies in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edited by Jane Jenson, and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Aldershot: Ashgate.
- Jepperson, Ronald L. (2002)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ociological Neoinstitutionalism. Pp. 229-266 in *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Joseph Berger, and Morris Zelditch, Jr.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Jessop, Bob (1990) Regulation Theorie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conomy and Society* 19(2): 153-216.
- (1997) Twenty Years of the (Parisian) Regulation Approach: The Paradox of Success and Failure at Home and Abroad. *New Political Economy* 2(3): 499-522.
- (1999) Narrating the Future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State: Remarks on Remapping Regulation and Reinventing Governance. Pp. 356-378 in *State/Culture: State-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edited by George Steinmetz,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essop, Bob, and Ngai-Ling Sum (2006)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Kotz, David M., and Terrence McDonough (2010) 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Pp.93-120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i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Terrenc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pietz, Alain (1985) *The Enchanted World: Inflation, Credit and the World Crisis*.

- London: Verso.
- (1987) *Mirages and Miracles: the Crises of Global Fordism*. London: Verso.
- MacKenzie, Donald (2008) *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McDonough, Terrence (2010)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Pp. 23-45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i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Terrenc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Kotz.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1997)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 144-181.
- Mitchell, Timothy (1998) Fixing the Economy. *Cultural Studies* 12(1): 82-101.
- Nielsen, Klaus (1991) Towards a Flexible Future—Theories and Politics. Pp. 3-32 in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 Restructuring State and Industry in Brita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edited by Klaus Nielsen, Bob Jessop, Hans Kastendiek, and Ove K. Pedersen.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Ong, Aihwa (2006) *Neoliberalism as Exception: Mutations in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7) Neoliberalism as a Mobile Techn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2: 3-8.
- O'Hara, Philip (2005)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and Modes of Regulation*. London: Routledge.
- Peck, Jamie, and Adam Tickell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3): 380-404.
- Piore, Michael J., and Charles F. Sabel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Y: Basic Books.
- Saillard, Yves (2002)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Sector-based Specialization: What is the Future of National Regulation? Pp. 183-189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ited by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London: Routledge.
- Simmons, Beth A., Frank Dobbin, and Geoffrey Garrett, eds. (2008)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ringer, Simon (2012) Neoliberalism as Discourse: Between Foucauld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rxian Post-structuralism.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9(2): 133-147.
- Steinmetz, George (1994) Regulation Theory, Post-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6(1): 176-212.
- Storper, Macheal, and Allen J. Scott, (1989) The Geographical Foundations and Social

- Regulation of Flexible Production Complexes. Pp. 21-40 in *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edited by Jennifer Wolch, and Michael J. Dear. Winchester, MA: Unwin Hyman.
- Streeck, Wolfgang (2011) How to Stud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a plenary session on “Study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10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al Relations in Turbulent Times”, Geneva.
- Tickell, Adam, and Jamie Peck (1992) Accumulation, Regulation 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st-Fordism: Missing Links in Regulationist Researc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6(2): 190-218.
- Went, Robert (2002) *The Enigma of Globalization: A Journey to a New Stage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